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ChineseStudies

| 阎纯德 主编

| 第十四集

汉
学
研
究



 學苑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1522341

ChineseStudies

| 阎纯德 主编

| 第十四集

汉
学
研
究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522341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学研究. 第14集/阎纯德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77-4090-5

I. ①汉… II. ①阎… III. ①汉学—文集 IV.

①K207. 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3196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封面设计: 艾博堂文化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960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0.00元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问：汤一介 李学勤 王路江 安平秋 李宇明 李向玉

主任：崔希亮

副主任：韩经太

主编：阎纯德

副主编：周 阅 钱婉约

编委：乐黛云 王 宁 王晓平 方 铭 许光华 朱政惠
严绍璦 李明滨 李庆本 张国刚 张西平 张 华
何培忠 杨翠微 宋伯华 杜道明 周 阅 柴剑虹
钱林森 钱婉约 耿 昇 徐志啸 崔维孝 阎纯德
阎国栋 熊文华

卷前絮语

春天不是人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人间,就是大模大样地姗姗来迟。今年的春天格外诡谲,当圆明园和香山脚下的植物园刚刚迎来百万踏青者,时隔数日,一场不大的风雨,便把郁金香、碧桃、海棠和二月兰编织的赏心悦目的春色一下子散落在昨日的回忆之中。我到处寻找,问那踌躇于北方人家门前的夏,它则不温不火、心平气和,说是一切都由时序定生死,人类自己没自由。解放了的人类,无法跨越天设雷池,人要胜天,难矣!天道、人道两条路,但是人道必须沿着天道走。人道靠天道而生,原来天道是约束人类自由的生存之“道”。

这一集《汉学研究》之所以又以“国学特稿”刊载刘明武先生的《十月太阳历背后的智慧与当代难题的解答》,其初衷依然是编者认为该文道出了文化学者很少涉及的文化问题。这篇不拘一格的学术文章是以中华先贤以天文论人文的基本思路、以太阳论天气的基本方法展开的,分别论述了文化研究中的六个问题、彝族十月太阳历及其形成的思路与方法、十月太阳历背后的智慧与当代难题的解答。这个特大的文化问题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沈善增先生论述《崇德说》的大文,关乎着人类的和谐发展与前途,其重要性值得关注。

严绍璁教授撰写的“综述”之重点在于梳理从1977年至2007年中国的汉学研究之“概况”,但这篇宏文却颇似一部百年研究简史,读者可将中国的汉学研究的兴衰与沧桑了然于心。严绍璁教授是我们这代人中关注和研究国际中国学(汉学)并取得骄人成就的先驱学者,他的研究远非只限于中日文化关系方面,其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学界均有影响。这篇大文以严谨的学风、丰富的文献、细密的思维,将中国学人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的人物、著述、事件汇成远山流泻而下的一道长河,不仅可以令人溯源,还可以让人们惊喜地发现:我们关注他山之石并非始自当下,中外文化交流史是以同时、同步的方式发生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之中的。严绍璁教授如数家珍地展示发生在中国最近的这场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崛起与发展,成为中国学人集体营造的学术风景。在世界广泛的人文社科学术中,表述与传达中国学界与世界学界以“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相互认知”为基本核心、紧密连接国学的前世今生的汉学研究中,中国学者在文化从“文革”死灰中涅槃之后,这一独特的跨文化的汉学研究不仅有了圆满的复

兴与长足的发展,而且已经形成“宏大之势”。严绍璴教授认为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这一学术在诸多层面中逐步凝聚能量,“已经成为30余年来我国人文学术在近代意义上的新的觉醒并逐步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标志性学科类别之一”。参与者已经形成队伍,并远远超越了纯粹意义上的“人文社科学者”,相关的“学术活动”渗透于人文社科乃至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

“汉学研究30年”这个栏目下,还有一篇关于耿昇先生的访谈录。编者一直物色作者能写一篇关于耿昇学术成就的文章,这篇访谈算是一个补救。耿昇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是汉学研究学界的巨擘。在过去的30年间,他翻译了法国汉学家的重要学术著作近60部、3000万字,涉及中亚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蒙古学、中国与阿拉伯一波斯关系史等领域,是学界的一位劳动模范。他的诸多译著与撰述成为汉学研究者和中法文化比较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汉学与‘汉学主义’”的学术争论肇始于周宁教授的《汉学或“汉学主义”》。这一栏六位知名学者的精彩笔谈系由乐黛云、李比雄(法国)、钱林森教授主持的《跨文化对话》移师而来,参与笔谈的学者的高论各有千秋,其观点非常值得关注。

真正的学术争鸣既是智慧和真诚的较力,更是科学观与历史观的学理表达。《汉学研究》所以重视讨论或争鸣,是因为编者认为虽然国人关注汉学研究始自明末清初,但是人们对汉学和汉学研究的理解还远远没有成熟。汉学的生成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结果,汉学源自国学,但国学不是汉学,汉学具有深厚的跨文化的学术个性。我们将继续关注“汉学与‘汉学主义’”以及“国学与汉学”等诸多与汉学研究相关论题的探讨,深信这些讨论与争论必将有助于汉学研究理论的提升和真正中国式的汉学研究理论建设。

2012年4月2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副院长携该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梅俊杰教授和潘玮琳“走京华”途中到寒舍“走基层”。他们带来许多关于汉学(中国学)研究方面的资讯,蓦然使我在凋谢的时序中感受了一场方兴未艾的盎然春意。黄仁伟副院长告诉我,201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要举办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则要举办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人间的事,全靠人创造。中国兴,国学兴,汉学兴。国外汉学热,国内研究热。自2011年起,“新汉学”又从神州崛起,这亟待学界关注。文化之事、学术之事只要国家给力,汉学及其研究的前方,必将诞生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

阎纯德

2012年5月12日

目 录

汉学研究 30 年

中国(大陆)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 30 年(1977—2010) / 严绍璎(1)

积跬步以至千里的翻译家——耿昇先生访谈录 / 耿昇/钱婉约 贾永会(23)

汉学与“汉学主义”

学术争论及其他 / 钱林森 阎纯德(33)

“汉学”和“汉学主义”及相关问题 / 方维规(36)

对所谓“汉学主义”的思考 / 张西平(43)

汉学或“汉学主义” / 周 宁(56)

“汉学主义”: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 王柏华(69)

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 赵稀方(78)

也谈海外汉学与“汉学主义” / 季 进(81)

国学特稿

十月太阳历背后的智慧与当代难题的解答 / 刘明武(85)

崇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 / 沈善增(96)

美洲汉学研究

通过科技万花筒透视美国汉学 / 熊文华(108)

杜甫诗歌在另一种维度上的镜像功能——美国汉学界唐诗研究方法掠影 / 李 博(165)

论宇文所安唐诗翻译实践与策略 / 高 超(174)

《诗经》“兴”在北美汉学视阈中的阐释 / 李 珍(191)

欧洲汉学研究

米歇尔·莱里斯著《中国日记》导言 / [法国]贾敏著 赵维纳译(203)

悼念钢和泰男爵 / [德国]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著 马军译(217)

英国汉学家梅辉立的《中国辞汇》探析 / 常 峻(230)

试论《中华帝国全志》对儒家的描述 / 张明明(237)

《马嘉理行纪》的汉学价值 / 程 龙(244)

许地山的《春桃》和老舍的《也是三角》——一妻多夫制在中国流行吗?

/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alík)著 李贵成 闫瑞译(256)

中外文化交流

里昂中法大学与中法文化交流 / [法国]黄晓敏(264)

吴历《湖天春色图》研究综述 / 蒋向艳(280)

俄国汉学研究

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司格林和中国俗文学研究 / 李明滨(288)

18世纪俄国来华使节笔下的中国社会风俗 / 阎国栋(293)

亚洲汉学研究

日本江户时代中日翻译研究的杰作——荻生徂徕的训读批判 / 王晓平(305)

青木正儿的中国之行与中国研究 / 周 阅(321)

日本的鲁迅比较研究 / 蒋永国 吴 丹(333)

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 / 贾永会(344)

贺清泰《古新圣经》小探 / 王硕丰(355)

再读《车尘集》——从日本近代汉诗的翻译谈起 / 王广生(366)

汉学译稿

关于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 / [比利时]高华士著 余三乐译(375)

冰下的火种:鲁迅 / [比利时]西蒙莱斯著 张健译(408)

西方中国游记散论 / [法国]尼奈特·布思罗伊德著 刘欣译(413)

争鸣之页

“Scielou”无疑为余乐吾——与刘利平教授商榷 / 宋黎明(428)

书评与动态

追求与超越的学术典范——评刘正教授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 马彩云 黄 溟(438)

中国(大陆)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 30 年

(1977—2010)

严绍璿

“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作为在世界广泛的人文社科学术中表述与传达我国学界与世界学界以“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相互认知”为基本核心的一个独特的学科类别^①,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人文学术的逐步繁荣,在诸学科的全面恢复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或许可以说,这一学术在诸多层面中逐步凝聚的学术能量,已经成为 30 余年来我国人文学术在近代意义上的新的觉醒并逐步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标志性学科类别之一。

本文旨在追踪这一学术 30 余年来在“复兴”中逐步发展的基本势态,作为我国当代学术史的一个层面而为社会提供一个相关的“学术工具”。由于本学术在发展中的规模已经形成宏大之势,参与者的队伍已经远远超越了纯粹意义上的“人文社科学者”,相关的“学术活动”渗透于人文社科乃至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所以,本“综述”只能以扫描的方式对本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一概述性展示。当聚合万事于一编之中时,则疏漏之处几乎每年皆有,笔者于此心有戚戚焉。读者诸君若能把本“综述”的提示与本学术中已经积累的相关的著作论文结合起来阅读,并参考本《年鉴》的《大事记》,则对本学术可以获得更加确切的把握^②。

一、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的“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回顾

我国学者对于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学术的“自觉意识”,是随着 20 世纪初我国人文学术近代性的发展而得以逐步形成的。当代“国际 sinology”学术正是在前辈学术的基础上得以继承、更新、提升而获得发展的^③。

有学者判断本学科是近 30 年来“新兴起来的学术”。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这多少有些“时空的错位”。现有的学科材料表明,这一学术的萌动始发于

20 世纪初期,它与我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几乎同步。

依据目前的材料,1911 年冯承钧在法国索邦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后,即进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这是第一位从事欧洲 sinology 研究的中国学者。冯承钧的研究在中外交通史、边疆史、元史诸领域中,高度瞩目欧洲学者已取得的业绩,作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例如,经由他翻译的希格勒(G. Schlegel)著《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沙畹(E. Chavanneb)著《西突厥史料》,多桑(C. Dohsson)著《西域考古记举要》与《蒙古史略》,费瑯(G. Ferrend)著《蒙古史》,伯希和著《交广印度两道考》、《郑和下西洋考》与《蒙古与教廷》,沙海昂(A. S. H. Charignon)注解《马可·波罗行记》等欧洲学者的著作,架起了 20 世纪早期中国学者认知国际 sinology 的桥梁,冯承钧可以被称为“中国国际 sinology 研究”的第一人。

1920 年王国维在《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九期上刊发《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这是我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首次言及敦煌文学资料与本国文学发展之关系。王国维文中有相当的材料与基本看法,来自 1916 年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奠基者之一、国立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在日本《艺文》上刊出的他在欧洲追踪斯坦因和伯希和敦煌文献的调查报告。这是可以确认的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把“日本中国学”的论述作为“材料碎片”丰富自己研究的最初的实例。在一定的意义上或者说,它开启了其后在鲁迅、茅盾诸位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关注国际中国学(汉学)多层面表述之先河。

鲁迅是一位高度关注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者,1920 年 11 月 24 日他曾在给日本当时年轻的中国学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信中说:“拜读了你写的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与希望所作的公正的评价。”这是现在见到的中国学者对国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次最明确的评价。鲁迅此信是对同年(1920 年)9 月到 11 月日本《支那(中国)学》月刊上连续三期刊载的青木正儿研究中国文学革命的长篇论文《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一文作出的回应。鲁迅从胡适手里接到青木正儿的论文,仅仅几天就对青木正儿作了这样明确的评价^④。

与在文学研究层面此种萌动几乎同步,在语言学研究层面上也见到了积极地关注国际中国学(汉学)相关业绩的学者,1923 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开设“汉语音韵学”课程,使用瑞典中国学家高本汉(Klas Benhard Johannes Karlgren)刚刚刊出不久的即 1915 年的《古代汉语》(*L' Ancien Chinois*)、1916 年的《现代方

言描写语音学》(Phonetique Descriptive Des Dialectes Modernes)和 1919 年的《历史上的研究》(Etudes Historiques)三篇论文作为阐述“拟构‘切韵音’”(中古音)的主要教本^⑤。这一举措无论在我国教育史还是在“国学”学术史上,都具有破石惊天之功。当时若以年龄而论,北大的钱先生比欧洲的高本汉还要年长,但钱先生作为 20 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开创了中国大学教学中引入国际 sinology 研究的有价值的成分的先河。北大当年的汉语“古音研究”课程采用欧洲“中国学”研究成果作为教材这一举措,就今天而言,也是大多数大学所不能企及的。我们把上述这样几个实例作为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介入国际中国学(汉学)学问,应该说是可以被认定的。

进入 30 年代,中国学(汉学)的研究,在国内开始出现了稍具规模的形态,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中:一是出现了中外学者联合的“专业性”工作机构;二是开创了近代我国学者在海外追踪中华文献典籍的作业;三是相关学者开始了在特定的学科中对“国际汉学(中国学)学术史”的梳理。

1930 年 9 月在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共同建立“燕京—哈佛学社引得编纂处”,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中国学人与国外成员合作进行汉籍整理的专门性机构^⑥。从 1931 年 2 月到 1949 年秋(除去日军占领时期)前后 10 余年间这一机构聘用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集中编制中国古文献的“索引”,制成“引得正刊”41 种、“引得特刊”23 种。总称为“Sinological Index Series”。与这样的汉籍“引得编纂”相类似的“sinology”的作业,当时还有设置在北平的中法学院研究所等。

30 年代在本学术史上应该重彩表述的,则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了对流布在海外的中华文献典籍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术性追踪。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由黄遵宪、杨守敬诸位开始以自身的学术际遇而关注流布于彼地的汉籍文献。他们报告和著录的绝大多数域外文典,皆是躬身目验,于我国近代国际中国学(汉学)学术具有奠基之功。但黄遵宪、杨守敬诸位的“域外汉籍”寻访还只是集中于日本一地,调查者也未有完整的“学术构思”,皆是随手所得,著录成编。20 世纪 30 年代以王重民、向达诸位为主体的“海外敦煌文典”的追踪调研,开创了我国近代国际中国学(汉学)学术在“域外中华文典”调研的一个极具学术意义的领域。

从 1934 年起,王重民在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学

术规划”下被派遣前往法国,开始在巴黎图书馆等调研当年被伯希和窃取的敦煌典籍文档,开始了他对流布在欧洲与美国中华文典的毕生的追踪和研究。1935年王重民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调研被斯坦因窃回的敦煌文档,同年又在德国普鲁士图书馆等调研太平天国文献以及汉籍珍本。1937年在梵蒂冈图书馆与刘修业一起阅读和摘记明清时代来华传教士关于汉籍的译著以及笔记等。1939年又赴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鉴定汉籍善本近2000种。从而成为我国近代国际中国学(汉学)学术史上开创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的从事“域外中华文典”的“文献学”著录的第一人。

与王重民的几乎贯穿整个30年代的“域外典籍”调研相呼应,向达也于1935年前往欧洲,寻访敦煌遗书、汉籍珍本和我国历代通俗文学写卷本,建树甚厚。同一时代中,文学史家孙楷第于1931年赴日本,继续先辈的东瀛汉籍寻访,集中于文学类尤以“小说”珍本为大宗。几乎与此同时,王古鲁在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日本所藏中国古小说、戏曲典籍的寻访。1941年他在《中日文化月刊》一卷三期上撰文《摄取日本所藏中国旧刻小说书影经过志略》,共摄得日藏汉籍孤本10余种,相关书影100余幅。上述数位学者关于流失海外的“中华文典”的寻访和著录,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近30余年来“国际中国学”研究中从文献目录学和跨文化诸层面中从事“海外文典”的追踪、复制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极有成效的示范。

30年代我国学者关于国际中国学(汉学)学术的第三个层面,则是出现了使用“中国学”这一学科称谓,并由此也出现了从事学科发展史研究的学者。本文特别要提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汉语言研究的杰出的学者魏建功,他作为我国“汉语言古音研究”的杰出学者,于1934年出版了《古音系研究》,此书被后世评定为“(汉语古音学)从传统的研究通向近代的研究桥梁”(1956年被评定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今的“院士”资格时的学术鉴定),魏建功在《古音系研究·后序》中阐述了由沙畹(E. Chavannes)和伯希和(P. Pelliot)等开创的,由马伯乐(H. Maspero)、爱约瑟(J. Edkins)、赛莱盖尔(F. Schlegel)、武尔披齐利(Z. Volpicelli)、桑克(S. H. Schaank)、瞿乃德(G. Kuhnert)、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伏尔克(A. Forke)、高本汉(B. J. Karlgren)、卓古诺夫(A. Dragunov)、西门华德(W. Simon)等相互影响的欧洲汉语学家的学术关系,最后又联系到国内的李方桂、罗常培诸位。魏建功表述的,实

际上是对欧洲中国学界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关于“汉语语言学”研究的谱系梳理,构成这一特定时空中“欧洲中国学”关于“汉语言古音研究简史”。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魏建功在论述中已经把“Sinology”这一学术概念明确汉译为“中国学”。这是我国学者在出版物中首次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定位从“汉学”概念跃进到“中国学”的层面。

与此同步,1934 年 9 月周一良在《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上刊载《日本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贡献》,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对 20 世纪初期日本中国学形成时期“京都学派”的奠基性学者的学术做出的论述。1936 年 3 月王古鲁刊出《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Recent Sinological Studies in Japan*)。本书以日本关东地区为中心,整理报告了大学中 Sinology 专业的设置、课程的开设、研究的课题以及相关的藏书机构和研究机构等,成为当时学界认识“日本中国学”的入门导引。从学术史上考察,王古鲁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作为书名标题,又使用英文标明“Sinological Studies”,则是继魏建功之后再次把“Sinology”阐述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具有“总摄性”的范畴。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后大约 35 年间,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一系列重大的与严酷的冲突与变动中,近代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由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萌动的发展趋势受到了严重的阻滞,这一门学科的总体在长时间中陷入了沉寂的状态。但也绝对不是悄然无声,其中必须提到的是 1949 年北平文化出版社刊出莫东寅撰著的《汉学发达史》。此书作者在 20 年代以来先辈学者略已展开的学术视野中以 7 章的篇幅从“秦汉六朝时代欧人关于中国之知识”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汉学之发达”作了一个概略性的阐述,可以称为我国学者撰著的关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第一部学术史^⑦。

此后,1950 年王重民编就了《敦煌曲子词集》,1957 年又完成了《敦煌变文集》的编纂^⑧。在 60 年代的上半期,我国学者关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总体上陷于“冷漠状态”,尽管如此,有两个层面的动态尚可留意。

一个层面是当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基地,在把国际中国学(汉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中,以汉文翻译为主,编纂了若干“国际中国学”论著,例如 1961 年商务印书馆刊出近代史研究所编译的《外国资产阶级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论著选译》,这一思潮一直发展到“文革”中,例如翻译了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撰著的《异民族中国统治史》等。另一个层面则是北京大学在悄然无声中零星地继续

从事推进这一学术的相关的工作,可以回味的大致有六项“学术活动”维系着本学术的运作:一是王重民在横遭政治上的冤屈的同时,1962年终于完成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编纂。二是1962年为纪念“敦煌文典发现60周年”,北大魏建功、阴法鲁、向达、王重民诸位在该校古典文献专业首届1959年级开设为期半年的“我国敦煌文献发现60年专题学术讲座”,其中设置专题讲授了“斯坦因、伯希和对敦煌文献的掠夺与处置”等。三是1963年5月,北大中文系邀请苏联中国学家波兹德涅娃访问,并以“欧洲学者汉语言研究”为题举行学术报告会,系主任杨晦主持讲演,明确称呼讲演者为“苏联和欧洲著名的中国学家”,师生听众有600余人。这是“新中国大学”中第一次由一位外国学者开讲“欧洲中国学”。四是北大哲学系朱谦之从1958年起依据20世纪初期日本井上哲次郎撰著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第一版)、《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第一版)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9年订正三版),编译刊出了《日本的朱子学》(1958年三联书店刊)与《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二书,在当时“中国学(汉学)荒芜”的时代具有引进“日本中国学”之功。五是1964年4月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总理办公厅主任齐燕铭提出:“乘原燕京—哈佛学社中方老人尚在,开封1949年由北平市军管会封存的相关材料,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哪些对我们是有用的,哪些是没有用的。这份工作迟早是要做的,晚做不如早做的好。”嘱咐北京大学确定一两名青年助教与老先生一起工作。同年8月18日在北京大学副校长魏建功主持下,向达、聂崇歧和助教严绍璁,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协助下于北大“才斋”开启被封尘了16年的中美合作编纂的“中国学材料”。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第一次带有官方意向的与“燕京—哈佛学社引得编纂处”的会面。这一工作由于9月下旬齐燕铭被最高领导指认为“修正主义者”而在10月3日被迫停止,但它却是中国文化发展意欲向一个更高层次上跃进的又一次萌动挣扎,它与10年后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起始之时人文社会科学界迅速推动“国际中国学(汉学)”这一学术的兴起具有内在的姻缘连接。六是1965年初教育部将日本京都大学三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年轻助教安排在北京大学进行定向学科“访学”,其中兴膳宏、吉田富夫在中文系进行“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访学”,狭间直树在历史系进行“中国近代史”的“访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接受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学者进行较长时期的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专项学习,事实上成为当代我国“汉学培训”之先河。他们在其后的

40 余年间成为了“日本中国学”领域杰出的学者^⑨。

二、1975—1986 年：“国际中国学(汉学)”在新时期的复兴

1976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组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设“情报研究所”，由经济学者孙越生组建“国外中国研究室”，编辑出版公开刊物《国外中国研究》。以此作为标志，我国人文社科学术中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国际中国学(汉学)”学术自 20 年代萌动以来在艰难曲折中前行而在迎接新时期到来之时开始了进入了真正的“学术复兴”阶段。

作为这一“复兴阶段”的最主要的标志大致有四：一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并有北京大学跟进，建立了我国“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学术据点。二是以此为基础，开始收集、解析、整理和公刊涉及“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资料。三是中国学者开始与世界上的从事中国学(汉学)的学者建立了初步的学术联系。四是经过 10 年的努力，“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终于作为一门“学术专业”而在我国大学中进入了“研究生(硕士)”学位培养序列。

在上述四个层面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复兴这一学术中的首创之功。当时刚建立的情报研究所，特别是由孙越生领导的“国外中国研究室”集合了研究所内外对“国际中国学”有兴趣的中青年人文学者(如姜筱蓁、冯蒸、严绍璁等)在他的智慧的引领下，集思广益，共同探索，在编刊《国外中国研究》的基础上，编著了我国第一套“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并由当时组建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79 年冯蒸编著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09—1978)》刊行，1980 年严绍璁编著的《日本的中国学家》(1105 人)刊行，以后陆续刊出了姜筱蓁等编著的《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卷)、孙越生主编的《美国的中国学手册》等，从而使中国社科院情报所的“国外中国研究室”成为新时期“中国学复兴”萌动的最初的学术基地，孙越生应该作为我国“国际中国学(汉学)”学术复兴初始的引领者而永远留存于学术史上。

这一初始复兴时期的“国际中国学(汉学)”出版物，还应该提到的有 1977 年 7 月起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编辑出版的不定期的《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严绍璁编译，内部资料)，至 1980 年 6 月总共发刊了 14 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古籍整理出版通讯》(杨牧之编辑，内部刊物)从 1979 年 4

月第四期开始刊登我国学者编纂的以当代“日本中国学”中“中国古典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快讯”,其中1981年3月该《通讯》以“特刊”形式单本刊发了“专题特稿”《日本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及其争论点》(严绍璁翻译并编纂),综合报道了自1966年至1978年(中国“文革”期间)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概况,总结归类为在10个研究层面中的争论。这一综合文稿引起了日本“中国学界”相当的关注。1980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辑出版《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内部刊物)至1995年停刊,共出版27期,其中有分量不等的主要是关于欧洲中国学的历史和现状的译稿,知识含量相当丰厚。这三个“期刊”虽然都是在内部刊发,但事实上在学术界有较多的受众面,在为复兴我国“中国学研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呼风唤雨”的作用。

在上述系统的出版物之外,还不应该忽视的是像《国外社会科学》等公开的刊物刊载了学者个人积累的关于相关国家的中国学(汉学)的知识。例如1978年5月号发表了瞿霭堂《英国的中国研究》,1979年1月号发表了秦麟征《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4月号又发表了白玉英《意大利汉学研究活动》等。此外,1979年11月的《中国出版》上刊登了《李学勤同志介绍美澳中国学研究情况》,同年《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Z2)也发表了潘世宪的《日本蒙古史研究概况》等。

在上述这些学术的复兴活动中,饶有兴趣的是学者们关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研究”这一学科在汉语语境中的学术命名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分歧。中国社科院以“国外中国研究室”为代表,把这一类型的学术总体上称为“国外中国研究”,在系列的出版物中又以“中国学”命名,李学勤1979年关于“美澳中国学研究”的报告、严绍璁1980年出版的《日本的中国学家》、冯蒸1981年出版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等皆以“中国学”称之;同一时期以《国外社会科学》为代表,发表的例如“莱顿大学汉学”、“意大利汉学”等,在汉语语境中又把这一学科以“汉学”称之。不过就当时的学术状态而言,学人们对这一学科命名的不同,大多数仅是依据自己的习惯,并未做过较为深入的思考,也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发展到21世纪初期在学界内围绕关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学理性质”的讨论才涉及了在“汉语语境”中对这一学术命名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初始,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明显地呈现增量趋势。冯蒸在1979年编著《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了《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王利器著《文镜秘府论校注》等。

同时期也开始了相应的国际中国学(汉学)原典文本的汉译和出版。1981 年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刊出《丁玲研究在国外》,1986 年中华书局出版辛冠洁等翻译的《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范文主编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刘柏青主编的“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同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王尧主编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在其后 10 年中刊出 18 辑),从而在相对广泛的学术层面中以蓬勃的朝气推进了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由此开始了这一层面中“原典文献”汉译的繁荣局面。

继此之后,1988 年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开始出刊,由此开始了“国际中国(汉学)”原著的较大量的汉译。例如,1989 年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1993 年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0 卷,中华书局出版。1992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1993 年,中华书局开始出版“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1997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1998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开始出版《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时事出版社开始出版《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直至 2005 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王晓平主编的“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等等。

国际中国学(汉学)文本的较大规模的汉译,为中国学人理解和把握这一学术的基本内容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构成推进这一学术研究的有意义的参考层面^⑩。

在学术复兴初始的 10 余年间,我国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内开始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人际交往”。1978 年 5 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前野直彬(东京大学教授)受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外务省特别顾问吉川幸次郎的委托(由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安排)与严绍璽会见协商关于合作进行“日本中国学史”的研究,成为后来国内编辑出版《日本的中国学家》以及北京大学在全国大学课程中率先开设“日本中国学研究专题”等在一个层面中构筑的学术基础^⑪。1978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钟书赴哈佛大学作关于汉文化的系列讲座。同年 10 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章开沅到哈佛大学访问。1980 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章培恒应邀赴日本国立神户大学文学部讲学